

《张建章墓志》考

徐自强

墓志是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所藏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曾将当时所藏编成书本目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名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碑目、墓志类》，共收录历代墓志3407种，释氏塔铭74种，共3481种。以后虽续有收藏，数量大增，但一直未再刊行。1977至1978年，我们又开展了墓志的整理工作，将现藏的五千多种墓志拓片，重新登记编目，以满足读者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不少墓志材料是十分珍贵和有用的，张建章墓志就是其中之一。为使学术界充分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将陆续加以介绍。

张建章墓志，解放后出土于北京德胜门外，共二石，正方形，志盖长100、宽112厘米，中间为篆书题字，文为：“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盖周为十二辰象，每边三幅，每个时辰的象徵性动物，均置于人象的怀中，反映了唐代后期墓志的特点。志长95、宽96厘米，阳为正书志铭，张珪撰文，张总章书丹。铭文32行，满行31字，约900字左右（铭文附后）；阴为补刻之墓主官衔和迁葬题记，内容为：“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摄蓟州刺史、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

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公建章墓铭。中和三年十月十六日自邓村原改葬于幽都县礼贤乡高粱河北原”。

张建章，河北道定州北平人，汉时属中山国，所以志曰“中山北平人”。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生，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九月卒，享年61岁。张家世代为宦，本人也爵至上柱国，位至正二品，堪称朝中重臣，但史籍多缺载，此墓志出土才得以补缺。该志对张家世系及张建章一生事迹，记叙较详，尤其在唐朝与渤海国的关系方面，更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新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张氏家族，志称：“受氏于轩后，系祖于前凉”。轩后即轩辕氏之后。轩辕氏是我国传说时代的一个部落，具体情况，至今尚不可详考。说张氏为其后裔，也只能看成是一种传说，不可深究。前凉是公元四世纪时，由张轨在甘肃建立的割据国家。张轨为汉人张耳之后，西晋时官至散骑常侍，惠帝永宁年间（公元301—302），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平鲜卑、破盗贼，威著河西，官十三年而卒。其子实嗣位，晋朝拜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后自称凉州牧。东晋元帝大兴三年（公元320）被左右所杀。其弟茂嗣位，自号平西将军、凉州牧，太宁三年（公元325）卒。第四王为实之子——骏。他即位后，逐辛晏、克枹罕，有河南之地，于是分凉为三州，领有22郡之广大地区，自署凉王。至此，张不仅割据一方，俨然自成一国了。又传五世，至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为前秦苻坚所灭。志云：建此凉国之张氏，为远隔三百年后的唐朝张建章一家之远祖，在无确证之前，只能看成是一家之言。志文要提及于此，不过在求其耀祖光宗而已。但是，志文中据家谱所记的关于张氏最近五服的情况，则有不少重要史料，可补史书之缺。

张建章的高祖驥贞，大概是唐代武后至玄宗时期（公元七世纪后期、八世纪前期）的人，其官至皇特进朔方节度副大使（正

二品），爵至[鄯]注 国公（从一品），位至司空（正一品），已是唐代最高的官宦之一。节度使之职，始设于唐睿宗，当时只有范阳与河西两节度使。玄宗时为加强边疆防务，又增设平卢、河东、朔方、安西、陇右、镇西、北庭、剑南、岭南等八个节度使。节度使署内设官，据《旧唐书·职官志》称，除节度使外，还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随军等职。当时，朔方节度使署置灵州（今宁夏灵武县），主要是掌管与北疆有关的回纥诸部族事宜。颉贞任朔方节度副大使，可能就是在玄宗始置其官时所授。曾祖闾，官至特进太府少卿、河北陆运使，爵封临泾侯，赠太子[少] [傅]，都是三品以上之散官，也是朝中重臣。祖父[诜]，官至儒林郎（正九品上阶），定州北平县丞、知县事。父燥，官至[通]议大夫、检校太子右谕德、涿州别驾，都在五品以上。张建章从唐文宗大和年间入仕以后，至唐懿宗时的三十多年中，历任州司马、节度署内各职（随军、巡官、掌书记、判官等）、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各部郎中、御史中丞、正议大夫、太子左庶子、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史、蓟州刺史等职，并且皇帝唐宣宗曾面赐金紫，烜赫一时。可是，这个在唐朝中后期一百多年中，五代为宦的世家重臣，尤其在北方和东北方两大区域，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任过重要职务，有过功绩的人，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巨著中却只字未提，不为世知。现在，得此一盒墓志以补缺，增添了一部分重要历史史料，的确是十分可贵的。其中一些设官，如“节度巡官”等，为唐书《职官志》所未载，可补其不足，其作用就更大了。

其次，在张氏几代人的活动中，多有与北方各族交往的史迹，更值得一提。张贞是北疆朔方节度副大使，主与回纥诸部交往；张建章为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史，则专门与东北

注：凡[]中字，原文不清，为笔者所加，下同。

方各少数民族往来,其具体活动现在虽然知道得很少,但仅以志中所记张建章曾出使渤海一事,就对我国东北民族史的研究,汉族与东北少数民族关系史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东北少数民族,在我国边境民族中是最有活力的民族之一,渤海国的建立,就是其重要表现。创建该国的民族,是古代肃慎的后裔,汉时称挹娄,元魏时叫勿吉,北齐后改称靺鞨。粟末靺鞨在古代所建立之渤海国,实为肃慎苗裔在我国历史上显露锋芒之第一声,其后,完颜氏创建金国,爱新氏建立清朝,都与此有渊源关系。因此,对渤海的研究,对其有关史料的发掘、整理和搜集,这对今天我国通史和民族史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但这项工作,过去作得很少,直到清乾隆时才开始有关于渤海的专著问世,到二十世纪以后,成绩才更明显。这方面的书籍,除日本、朝鲜学者的著述以外,我国学者的研究著作,比较重要的有率宾唐晏之《渤海国志》,崇仁黄维翰之《渤海国记》,辽阳金毓黻之《渤海国志长编》(下称长编)等。其中《长编》一书,资料丰富(引用书达138种),内容充实,考证详慎,集以前各家之大成,对渤海的研究,作用甚大,是我们欲治渤海史者必读之书。本文在有关问题的讨论中,就基本上是以它为准,去加以比较,从而断定其志文之价值的。

东北通古斯族系统之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建立国家之初,自号“震国王”,后因唐代皇帝对他所赐的封号中有“渤海”之名,始改其国名为“渤海”。其国创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终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帝(公元926),历时229载。在这漫长的时期里,他们在我国东北的松花江和牡丹江一带的广大地域里,经营垦植,组织国家。他们仿照唐制,建立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行政机构。其疆域面积达五千余里。

渤海国据近代考古材料证明,是以使用铁器为主要工具的封

建制国家，与唐朝有极为密切的来往和臣属关系。武则天时曾封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唐睿宗时又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总。此后，渤海对唐的贡属就更是十分频繁了。据《新唐书》记载统计：唐玄宗时，渤海朝贡9次，代宗大历时25次，德宗时4次，宪宗元和时16次，穆宗长庆时4次，敬宗宝历时2次，文宗大和时12次，武宗会昌时4次，懿宗咸通时3次，总计约100次左右。但据《长编》记载，则说“渤海十五王中，朝贡于唐者凡132次”其次数更多。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当时是十分融洽的。

张建章与渤海的直接来往，据志文记载，是在唐文宗时期，当时渤海王为大彝震。大彝震王于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即位，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卒，在位28年，也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王。他在位时，仅在文宗大和五年至九年的四五年中，就朝贡唐朝多次，既到唐首都长安朝贡，也到就近的州郡幽州府纳聘。张建章之往使渤海，就是在这时代表幽州府还聘的。据志文记载，大彝震即位不久，就派遣了司宾寺之卿贺守谦到幽州府纳聘。幽府选报复，就派张建章借瀛州司马朱衣使行，以还聘渤海。他们于大和七年（公元833）秋出发，渡渤海、经辽东，于第二年秋末，才到渤海国首府忽汗州（今吉林敦化县一带）。渤海王大彝震热情接待，重礼相迎。张在渤海居住一年以后，于大和九年（公元835）秋月，调换回唐复命。他们离开时，渤海王隆重送行，并赠送宝器、名马、文革等珍贵礼品以作纪念，两方关系十分友好。张在渤海时，留心观察当地情况，搜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了不少作品，除一般的笺、启、赋、诗等外，回国后还著有《渤海记》三卷，详述该地风俗、营建、职官等情况，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现在，我们据志文去对勘有关渤海史迹，可纠谬、补缺之处

甚多，兹略举数例，以见一般。

1. 关于张建章出使渤海之任务

宋钱易《南部新书》说：张建章“曾赍戎命往渤海”；宋孙光庭之《北梦琐言》在记张泛海遇仙故事时，也称：“曾赍府戎命往渤海。”两书所记，虽小有出入（即《琐言》明确指出了是“赍府”之命），但共同点是：都认为张往使渤海是为“戎命”而去。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到底张是为何事而使渤海，值得进一步讨论：志铭记载说：“渤海国王大彝震，遣司宾卿贺守谦来聘，府选报复，议先会主假瀛州司马朱衣使行，癸丑（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秋，方舟而东……。”这说明：首先张使渤海是赍幽府之命，（当然是经过皇帝批准的）以《琐言》所记为确；其次，张出使之事由，是因渤海王先遣了主持礼仪之司宾寺卿来聘，幽府在奏请朝廷批复后，遣张还礼。另外从《册府元龟》974所记，渤海王大彝震在大和六年二月（即刚继位一年）就派王子大明俊入唐朝贡，在麟德殿受到唐文宗的接见。从这两件事实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大彝震继位不久，就马上开始了与唐朝的联系，一方面派使到中央朝贡，一方面派人到邻近州府，打通关系，以便利于自己的统治。从这种来往中还看不出有什么军事方面的任务；从幽州府来看，也是在纳聘上报后一经批复就即刻还礼，也反映不出有什么军情要事；从张到渤后，其王迎接的情况和以后的关系证明，也没有什么军事交涉和军事冲突之类的事发生。因此，两书所载，张往使渤海之事由，是“赍戎命”之说，恐怕是不大符合事实的。从现有的材料看，张此次出使，恐怕只有从改善和加强唐与边境少数民族或者唐与属国的关系方面去认识，才较为合乎事实。

2. 关于张建章往使渤海的时间

金毓黻在《长编》卷三中说：渤海咸和五年（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是岁，幽州节度府遣行军司马张建章赍书来聘”。但墓志则说：张建章是在“癸丑（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秋，方舟而东……，明年（即大和八年，公元834）秋杪达忽汗州”。为此，张往使渤海的准确时间，恐怕应从墓志所记为确。

3. 关于张建章任职的一些问题

《南部新书》称：“张建章四镇之行军司马也。”《北梦琐言》则说：“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后历郡守”。《宋史·王溥传》记为：“大和中有幽州从事张建章”。《玉海》所记亦同。金在《长编》中也断言说：“据此则建章之为幽州从事及使于渤海在太和中无疑，而为郡守则在其后也”；另外《长编》中还有张建章曾为“平卢节度从事”等记载。现在，根据志文所记，张建章一生中历任唐官十五、六职，其中均无“四镇之行军司马”、“幽州行军司马”、“幽州从事”、“平芦节度从事”等职，往使渤海之职，也只称为幽州府所管辖之“瀛州司马”。因此，上述职务，均在当时所刻之志铭中未载，是否准确，值得进一步研究。

4. 关于张建章的著作

金在《长编》中说：“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亦见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似元末尚存其书，否则依唐志所载而著录之宋志地理类中，又有张建章、戴斗合著《诸蕃记》一卷，盖建章官平卢节度从事，熟于番情，故能著此二书。”《诸蕃记》它书无考。《渤海国记》则记录较多，《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

文志》等均有记载，文均称为：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对此书，志文也有记录，铭称：“大和九年仲秋月，复命。凡所笈、启、赋、诗、盈溢细帙。又著《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可见，张建章出使渤海回国后，确有《渤海记》一书传世，不过其书名，应以当时之志铭所记为准，叫《渤海记》而不是《渤海国记》。但该书问世可能较晚，以至五代时之刘昫在编《旧唐书》时都未能见，但散佚却又太早，结果使南宋王应麟在编辑《玉海》时，也只转用了该书的一条材料。因此，其书可能在这时就遗失了，而不是在元代才佚去。

关于《渤海记》一书之详细内容，现已不可全知，但从北宋欧阳修主编之《新唐书·渤海传》与《旧唐书·海渤靺鞨传》有较大差别的情况分析，可能《新唐书》是采用了张氏《渤海记》的主要内容。金氏在《长编》中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可备参阅。《长编》说：“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地理类，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为旧书经籍志所不载，盖其书晚出为刘昫等所未见也。旧新两书记渤海事，颇有详细不同之处，旧书记册封、朝贡年月差详，然讫于王彝震之世，其后仅以开成后亦修职责不绝一语了之，盖其所可考见者仅此也。新书则于册封、朝贡记载甚略，而详于追谥年号，又载地理、官制、物产、品秩之事，取材视旧书为多，盖多取材于张氏。《玉海》十六地理类，异域图书条引唐志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注云：太和中又引王贻孙云，“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张建章《渤海记》言之”。《宋史·王溥传》亦云：“太和（实为大和）中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渤海国记》，贻孙者溥之子也。然新书所记，迄于玄锡，玄锡于懿宗咸通时凡三朝献，此或取自他书，不然则张氏卒于咸通以后，故所记如此。其书既佚而不传，故无由考其内容也”。金氏之说至确，志文也可提供一些证据。志铭称，张于咸通“七年（公元866）九

月十日，大病于官舍，享年六十一”。而渤海王玄锡继位在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因此玄锡朝贡之事，张书不可能记载，新唐书所记只能采自其它史料，此点可决“长编”之疑。金氏又认为《新唐书》的《渤海传》大量引用了张氏《渤海记》之说，则甚为有据，也可备一说。于此，我们可以说，张建章之《渤海记》，虽现在只在《新唐书》中留下了部分史料，但它对我们研究渤海的有关问题，确实是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的。

从上述几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以张建章墓志所提供的史料，就可以充分说明唐与渤海的关系，从其建国直至后期，其主要方面一直是十分友好的。他们之间相互了解、彼此交流的一切活动，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尤其对渤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就更大。这些活动对以后时期，统一强大中国的进一步形成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铁的事实，对今天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对他们还梦想沿着老沙皇的旧路，继续吞并我国东北领土的企图，也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第三、志阴迁葬记中说：“中和三年（公元883）十月十六日，自邓村原改葬于幽都县礼贤乡高粱河北原”。其志的具体方位，在现在北京之德胜门外护城河北，即高粱河北岸。类似的材料在北京出土墓志中还有不少，如北京西直门外出土的常俊墓志（唐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三日，公元779年6月21日）说：“葬于蓟城北高粱河南礼贤乡之原”。据说出土于西郊的唐陈立行墓志，其志铭说：“葬于幽都县礼贤乡之平原”等等。于此，我们可以说，幽都县礼贤乡之地望，确系在现在北京德胜门、西直门外之高梁河一带无疑。《旧唐书·地理志》说：幽都县为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所置，在幽州府治北一里左右。现幽都县礼贤乡在西直门、德胜门一带，其南一里外之地区，则为当时幽都府治——蓟城所在地无疑。因此，张建章墓志的出土，对唐时

蓟城、幽都县、礼贤乡等地方位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

总之，张建章墓志，史料丰富，作用甚大，所议数端，只是引玉之言，有关问题的进一步阐发，尚需详密的研究，方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史料价值。

附：张建章墓志铭

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摄蓟州刺史、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安定张公墓志铭并序

从兄幽州节度掌书记，中[散]大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珪撰

弟前幽州节度衙前散兵马使总章书

公讳建章，字[会][主]，中山北平人也。其先受氏于轩后，系祖于前凉，降及冠冕闲闾，历代沿袭，[家][谍][详]备，故编近以识之。高祖颙贞、皇特进朔方节度副大使，知使事，鄯[国]公，赠司空。曾祖闾，皇特进太府少卿，充河北陆运使，封临泾侯，赠太子[少][傅]。祖[詵]，皇儒林郎，守定州北平县丞，知县事。

考輶，[皇][通]议大夫、检校太子右谕德、涿州别驾。公幼聪而俊哲，美而和，时谓间生琳[琅]，乡中英妙。洎青襟从师，丹青有志，年十六，云水兴高，风月[吟]苦，旋自试于秋[赋]，[明][敏]著名，尚持疑于春[闱]，琢磨益厉。大和四载，博陵歉，尤迫旨甘，乃咄嗟而谋曰：仲由负米，毛义捧[檄]，孝敬之行也。予独何为，执以阙养违亲。便远游，方者燕，既馆[于]碣石。太保李公厚遇，糜之安次尉。逾年，李公入覲。弘农杨仆射受钺，星纪[冉]周。渤海国王大彝震遣司宾卿贺守谦来聘，府选报复，议先会主假瀛州司马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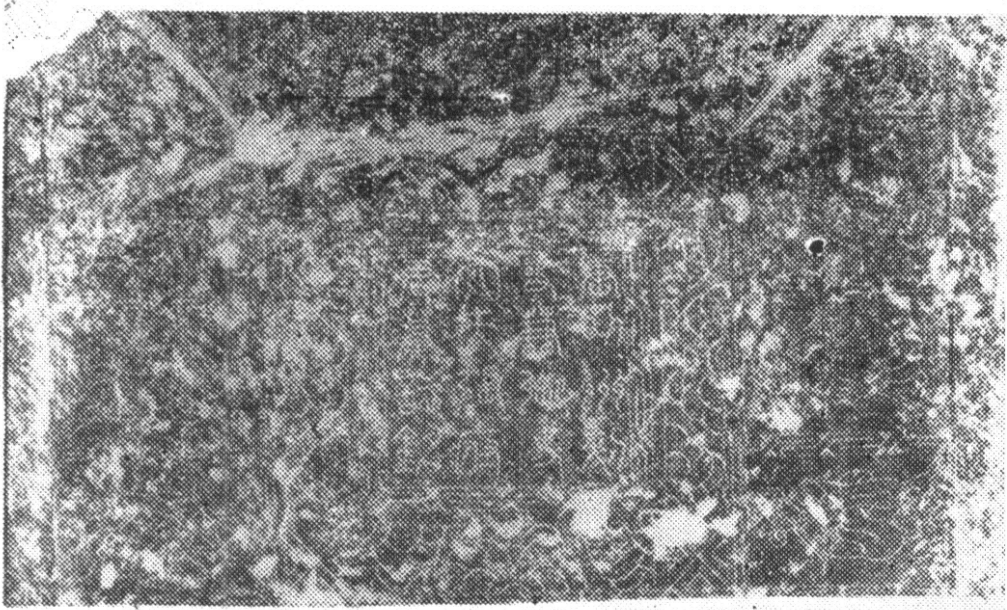
衣使行。癸丑秋，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州即挹娄故地。彝震，重礼留之，岁换而返。□王大会以豊，货宝器、名马、文革以饒之。九年仲秋月复命。凡所笺、启、赋、诗，盈溢缙帙。又著《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历司徒史公，知而竟屈，至太尉张公，以素分擢受节度随军。委之草檄，询之运筹，破虏荐名，授节度巡官、监察御史[里]行。寻迁幽州节度掌书记、转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展陈琳之笔，勒班超之功。不幸府故嗣袭，福王遥帅，公入处宾寮，迁尚书主客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将还，加水部郎中，充观察判官。无何，工部奉遗归阙。汝南周公代，[未]□而捐馆。

保相清河公，弓招，表升驾部郎中，余如故。洎□明之典，加兵部郎中，幽州节度判官。大中十二年敷奏，对扬大悦，圣旨面赐金紫兼御史中丞。贾生宣室之召，方朔辨对之机，[百]辟荣观。咸通[五]年四月奏升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正议大夫、检校左庶子兼御史大夫。储渥清崇，亚相显贵。六年十月摄蓟州刺史诸军事。期桑麦之瑞，慕襦袴之谣，渔阳大理。七年九月十日，大病于官舍，享年六十一。词锋没于逝川，学植摧为朽壤，悲夫！

夫人京兆韦氏，先公而谢五年矣。以咸通八年二月二日，迁窆于府城东南七里邓村之原，祔用鲁礼。有子二人，长曰冀，前莫州任丘主簿，迁衙前将；婴曰小丑；有女一人，适归义县丞石令存；皆禔慕号诉。以珪通旧且宗，请志陵谷，铭曰：

碣石山高兮，	上捧箕星；
桑乾水远兮，	下注沧溟；
中有崇岗兮，	叶吉泉扃；
贤人官业兮，	万古芳馨。

1979年5月



张 建 章 墓 志 拓 片